



文汇译丛·人物志

Herzog on Herzog

赫尔佐格 谈 赫尔佐格

[英] 保罗·克罗宁 编 钟铁南 黄渊 译

"The most important film director
alive" François Truffaut

W 文匯出版社



文汇译丛·人物志

Herzog on Herzog

赫尔佐格
谈
赫尔佐格

[英] 保罗·克罗宁 编 钟轶南 黄渊 译

"The most important film director
alive" François Truffaut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英)克罗宁,(英)赫尔佐格编著;钟轶南,黄渊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676-875-4

I. 赫… II. ①克… ②赫… ③钟… ④黄… III. 赫尔佐格-人物研究
IV. K835.16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043 号

图字:09-2004-707 号

Herzog on Herzog

© Werner Herzog, 2002

Commentary and Introduction © Paul Cronin, 2002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aber & Faber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by Wenhu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文汇译丛·人物志

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

编者/(英)保罗·克罗宁 译者/钟轶南 黄渊

责任编辑/刘刚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字数/260 千

印张/22 印数/1—6000

ISBN 978-7-80676-875-4 定价:37.00 元

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

(引言)

H e r z o g

o n

H e r z o g

引言

“对于那些可以‘有所依赖’的人来说，无一例外地会选择依赖。而且会一直依赖。因为他们给自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而对那些别无选择的人来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大卫·马麦

“我想在血淋淋的战争中，像骑士一样飞行。”

——《卡斯帕·豪泽之谜》

大部分你听到的关于赫尔佐格的事情都是不真实的。有关于这个导演和他的影片所散播的无根据的谣言和彻底的谎言，要比其他任何在世或已逝的导演都多。研究赫尔佐格生活和作品的过程是在无数来源中搜索的过程，而这些来源又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在最近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我承认我拐弯抹角地想让他说错话，在他的论点中发现漏洞，揭开一大堆自相矛盾说法中的真相。但是这些都是徒劳，如今我只能下结论说，要么他是个高明的说谎者，要么更加可能的是，他说的都是真话。

幸运的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无可争辩。1942年他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童年住在扎赫兰，一个离奥地利边境很近的偏远山村。他14岁开始徒步旅行，17岁第一次打电话。为给他的早期电影筹款，学生时代他就

在一个钢铁厂里做晚班焊工，由此有了 1961 年的电影《大力士》。他导演了 5 部克劳斯·金斯基主演的电影。弗朗索瓦·特吕福曾说他是在世的最重要的导演。但请注意：他不曾在摄像机后面用一支枪来逼迫金斯基演戏；在导演《陆上行舟》的时候，他也不曾用任何人的生命来冒险。他不疯狂，也不古怪。他的作品没有延续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他也不是个自大狂。相反，他是个特别令人愉快、大度而谦虚的人，而且有着特别的看法和直觉的智慧。同时他有着特别的幽默感，这使记录下的访谈怎么都显得不够传神。比如，以下这句他所说的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该怎么样转述？“我记得曾经和可爱的阿涅斯·瓦尔达有过公开讨论，我认为一个电影制作者除了有这样或那样的特长外，至少应该能够认清他或她自身的高度，她很不喜欢我的这个论点，好像还为此生了气。”

不开玩笑地说，赫尔佐格的 45 部电影（11 部剧情片，其余为他所谓的纪录片）是欧洲战后电影中最重要、同时也许是所谓“新德国电影”的关键。《生命的迹象》（1968）是一部非常自信的处女作，向我们展示了经典的赫尔佐格式反英雄人物：狂乱、孤立和危险。1970 年左派人士批评他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在拍摄影片《侏儒也是从小长大》这部侏儒接管救济院的怪异影片时，他解释说：“我不鼓吹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我所做的是讽刺。”1971 年他的电影《寂静与黑暗之地》述说了又聋又瞎的芬妮·斯陶宾格的故事，至今仍是最经典的纪录片之一。他在国际上的突破是在 1972 年，初次和演员克劳斯·金斯基合作拍摄了《天谴》，金斯基扮演一个狂热的西班牙征服者，他带领着一队人乘着竹筏顺流而下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最终走向了毁灭。

1974 年，赫尔佐格让布鲁诺·S——一个一生大部分时间呆在收容机构里的 40 岁男人——在《卡斯帕·豪泽之谜》中扮演 16 岁的卡斯帕·豪泽。两年后，在拍摄《玻璃精灵》时他催眠了所有的演员。他冲到即将爆发的一个加勒比岛火山拍摄电影《苏弗里耶尔火山》。他以自己的《吸血鬼诺斯费拉图》版本（1979）向 F. W. 茂瑙致意。1982 年，为拍摄《陆上行舟》，他在亚马逊丛林中拖着一艘船翻过了一座山。最近，赫尔佐格拍

摄了一系列的纪录片。《黑暗的教训》向我们展示了科威特燃烧着的油井。《为五种声音而死》讲述了卡洛·杰苏阿尔多的故事(维诺萨的王子,16世纪的音乐天才和多重谋杀犯)。在《小迪特要飞行》中讲述了越南战争幸存战俘迪特·丹格勒的生活。在过去的20年中,他在欧洲和美国导演了十余部歌剧,出版了几册散文集,还在几部电影中出演角色。

作为一名导演,他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他个人来说,我发现没有人对他的评论有他的母亲这样深刻:“在学校的时候,维尔纳什么也不学。他从来不读该读的书。他不学习,看起来他好像从不知道那些应该知道的东西。但事实上,维尔纳知道所有的一切。他有非凡的感悟力。即使听到一个很轻微的声音,10年以后他还能清晰地记得,他可以谈论它,还可能会用某种方式使用它。但他完全不能解释任何事情。那不是他的天性。所有的东西都融入了他的内心。通过他再表达出来时,就被他改变了。”

赫尔佐格这个人,在他的祖国德国被完全低估了,同时又在英语电影奖项中多多少少被忽视。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人们强烈要求有人来写一本这样的书,然而主要的障碍却是赫尔佐格自己。两年前,当我第一次联系他商议出版这本书的可能性时,我收到了一份手写的传真。上面这样写道:“我不做自我审查。我的确在刮胡子的时候照镜子以免刮伤我自己,但我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我不想协助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所以,《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永远不会被一个学院派或一个审美学家来编辑,因为这个电影导演对他作品的深层次意识形态和批评研究不会好好回答。他去年对我说:“当你向一个人问起他的孩子的时候,你不会问他出生的方式,为什么要对一部电影这样做呢?”

这本书的对话是按每部电影的年代排列的:从1962年的《大力士》到2001年的《纳粹制造》。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论坛,展示赫尔佐格拍摄的日臻完美的镜头,镜头中表现的是多年来让他着迷的事件、想法和人。这本书放弃了一望即知的分析,而是以事实为依据。我希望以此赋予尼采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以新的定义:“所有的文字都是无用的,都不能刺激行动。”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很少有人看过赫尔佐格的每部电影。

由此我尝试编辑我们的对话,以使我们的读者即使没有看过所讨论的电影,还是可以有一些直接确实的东西可以欣赏:一个故事或一件轶闻,由此可以产生一个主题,或者,按照赫尔佐格自己的话来说,产生一些比主题更让人兴奋的东西。

我们共同度过的时间大部分是在2001年1月和2月,也就是赫尔佐格在伦敦从事《纳粹制造》后期制作的那段时间。2002年2月我们在慕尼黑再次坐到了一起。然后一个月后又相聚在洛杉矶。这里展示的文字是用一部长得多的手稿剪裁而成的,因为那些有点“自白”式的部分,和那些不直接和电影本身有关的部分都被去除。赫尔佐格总是很小心地区分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个人的”,任何不是直接与电影有关的都被删掉了。另一方面,在漫长的谈话过程中,我们经常从不同角度重复谈到同一个主题,于是赫尔佐格的多次回答就被汇编成了一次,有时这就导致一个短问题牵出了一长串回答。“你应该让读者知道这一点,”赫尔佐格对我说,“我在这本书里显得话太多了,但我根本不是那种爱废话的人。”

几个月前,当我正忙于整理记录的资料时,赫尔佐格和我通了个电话。“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就绪?”他问道,“你应该用五天时间就把它弄出来,这书需要的不是结构,而是生命!把裂痕和漏洞留在那儿,过滤掉结构,然后把书写出来。”好吧,(多多少少)我是这么做了,但我仍然觉得这些文字拥有结构,以及鲜活的生命力。虽然寥寥三百页不可能记录下一段人生,虽然还有太多关于赫尔佐格生活和作品的事情留待未说(或至少未被出版),虽然现在对我来说这个男人只是比初次相遇时稍稍熟悉了一些,但我仍然觉得《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这本书相当成功地记录下了这个重要电影导演的想法、见解和感受。

和赫尔佐格在一起的日子特别引人深思(这是形容这段时间最好的一个词),它让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大卫·马麦改编版本)^①:

^① 美国著名剧作家,曾改编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三姐妹》等剧作,还是电影《大审判》、《铁面无私》等片的编剧。

赫尔佐格 H e r z o g 談 赫 尔 佐 格 H e r z o g

阿斯特洛夫：你要知道，那些这样或那样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停顿）

伊万·彼得洛维奇：是吗？

阿斯特洛夫：可不是嘛。

保罗·克罗宁

伦敦

2002年3月

(目录)



001	引言
001	1 浴帘
031	2 表演神灵、海市蜃楼
065	3 恰当的图像
101	4 运动和美学
135	5 正统性
169	6 挑战地心引力
205	7 魔术师的工作
243	8 事实和真相
279	9 生命之歌
309	明尼苏达宣言纪录片中的真相与事实
311	作品年表

1
)

(浴帘)



赫 尔 佐 格 谈 赫 尔 佐 格

(浴帘)

赫 尔 佐 格 H e r z o g

on

H e r z o g ·

在我们开始前,你是否愿给你的读者一些哲学见解,以便他们能在晚上安然入睡?

嗯,让我们来说说那些对所有的人类都至关重要的东西吧,不管他们是否是电影人。我就引用饭店业巨头康拉德·希尔顿的话来回答你的问题,一次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留给后人,他回答:“每次淋浴的时候,都要确保浴帘在浴缸的里面。”因此我现在坐在这儿给人们同样的忠告,永远不要忘记了浴帘。

你最初意识到自己要毕生从事电影拍摄是在什么时候?

从我能够独立思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自己会拍电影。我从未做出过成为一个导演的选择,在我14岁那年某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开始徒步旅行并皈依了天主教,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确信自己将成为一名导演。经历了一长串失败之后,介入电影拍摄仅仅是迈出的一小步。就算是今天,我仍然不能把这看成是一项真正的职业。

你以喜爱探索偏远地区而闻名于世,你是从何时开始旅行的?

在正式毕业前,我曾在曼彻斯特住过好几个月,一个女朋友让我爱上了那地方。我和四个来自孟加拉、三个来自尼日利亚的人合伙在那儿的贫民窟买了栋破房子。那是一栋19世纪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屋子,后院堆满了瓦砾和垃圾,房子里到处是老鼠。我就是在那儿学会了英语。19岁

时，也就是 1961 年，一等学校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我就离开慕尼黑前往希腊，我驾驶着一支车队中的一辆卡车来到了雅典。之后我到了克里特岛，在那儿赚了点儿钱后接着又搭乘一艘船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我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本来是比属刚果，当时刚果已经独立，那儿迅速出现了最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最邪恶的暴力。我一直被一种想法所吸引：我们的文明就像漂浮在一片混沌与黑暗深海上的薄冰，而此刻这个国家中所有极度危险的事物都浮现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当时到了刚果最危险的西部省份的人，后来几乎都死了。

那么在亚历山大之后你又去了哪儿？

我基本上沿着尼罗河旅行，一路来到了苏丹，如今我要衷心感谢上帝，在去朱巴的路上，我在这个离刚果东部不远的地方得了重病。我知道要想活命就得尽快返回，幸运的是我成功地回到了埃及阿斯旺。当时那里的水坝还在修建中。俄国人已经造好了水泥地基，那儿还有许多德国工程师在布电网，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在一间工具房里发现了我。我当时烧得很厉害，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呆了多久，对于当时所有的一切，如今脑海中只有些模糊的回忆了。只记得老鼠咬我的手肘和胳膊窝，它们肯定还想用我毛衣上的羊毛来做窝，因为当我舒展身体时发现毛衣上有个大洞。我还记得被一只跑到我脸上的老鼠咬醒，又看着它窜回了角落。那个伤口好几个星期后才痊愈，至今我脸上还有个疤。

我最终回到了德国，并在那儿拍摄了我最初的几部电影。我本该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但我只偶尔去过几次，所以我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个很认真的学生。我在学校时痛恨文学，但却喜欢听大学里一个女教授讲的课，她极有才智，但要求也极高。我很高兴自己如今拥有的一些洞察力正是她教给我的。

你父母对你想做个电影人的计划是什么反应？

我们不该说“父母”，因为我的父亲从未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过任何角

赫 尔 佐 格 谈 赫 尔 佐 格

(浴帘)

H e r z o g

o n

H e r z o g

色。唯独一次,1961年8月时,我在克里特岛时收到了母亲伊丽莎白寄给我的两封信,那是她在连续两天中寄出的。信中她写到我父亲迪特里希很焦虑,他想劝我不要做电影导演,因为在离开慕尼黑前,我已经明白地宣布过将在回来后从事电影。从大概十四五岁起,我就写了好几个剧本,并且向一些制片人和电视台提交过各种拍摄计划。我的父亲确信我的理想主义将在几年内被粉碎,因为他认为我永远不会实现我的想法。他认为我不具备从事这个行业的精力、毅力或意识,无法在电影业如此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那你母亲是什么态度?

我母亲采取了更为通情达理的态度。她并没有像我父亲那样阻止我,而是让我切实地考虑我一心一意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怎样做会更明智。她向我说明当时西德经济上的情况,并在信中要我好好打算自己的未来。她在信中写道:“我们从未详谈过这些事,这太糟了。”但母亲总是很支持我,每次我逃学好几个星期,她虽然不知道我在哪儿,但只要意识到我会离开好一阵子,就会立即给学校去信说得了肺炎。她知道我是那种不能被一直关在学校里的孩子。有好几回我都是步行并免费搭车去德国北部旅行,住在荒无人烟的房子或别墅里,为能不留痕迹地进入这些地方而自得其乐。

在这些信中母亲试图劝我回国,因为她已经安排我在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里做个学徒。我必须在9月之前回去,否则就会错过一年的时间。她觉得必须抓紧时间。一个就业专家告诉她电影业是个很难进入的行业,因为我只有高中文凭,应该从一个摄影工作室起步,之后我就能进入电影工作室。根据这人的说法,那将是进入电影公司做个助理导演的基础。但当时我心里已经有了别的计划,没人能让我改变了。

1942年你出生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的城市慕尼黑,在紧接下来的战后时期,你的成长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在我出生几天后,一颗炸弹摧毁了我们邻居的房子,我的家也被严

重损坏，一些飞散的玻璃碎片甚至溅到了我的摇篮里，但我们都幸运逃生，母亲带着我和兄弟们出城到了扎赫兰，一个德奥边境的小山村。那儿是战争末期抵抗运动在德国的最后一小块活动区域，地处环绕扎赫兰和奥地利蒂罗尔的凯塞伯格山脉，也是占领美军进入的最后一个地方。当时党卫军（注释 1）和狼人队（注释 2）正好在逃窜中经过那个村子，在逃进山中找到避难所之前，他们将武器和制服藏在了农民的干草下面。孩提时我就非常熟悉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因为母亲经常带着我和哥哥穿过边境去奥地利的维尔比克。她让我们俩帮着运送各种走私物品到德国，那都是些在我们这边找不到的东西。在战后的一段日子里走私极为普遍，甚至连警察也参与其中。

我的童年生活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小时候我对电影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电话为何物，当时一辆汽车绝对能引起轰动。虽然离慕尼黑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时的扎赫兰却是个非常闭塞的地方，我直到 12 岁时才知道香蕉是什么东西，17 岁那年才第一次打电话。我们的房子里没有抽水马桶，事实上根本连流动水都没有。我们没床垫，母亲就用干草塞满一只亚麻布袋子来代替，每到冬天我都会在早上被冻醒，盖的毯子上还覆盖着一层因为呼气结起来的冰。但像那样长大也很棒。我们得自己创造玩具，因此富于想像力，被我们发现的党卫军士兵们遗留下来的枪和武器也归我们所有。作为小男孩的我和当地孩子玩在一起，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平飞出去的箭，你得像抽鞭子那样把它扔出去，这样它能飞 150 多米。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虽然很难瞄准，但却能不停地飞啊飞啊飞。我们创造了身边的一整个世界。我身体的某些部分至今也没有真正适应我身边的事物，我仍然不习惯电话，每次它响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吓一跳。

可能如今的人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怪，可正是诸如发现武器藏匿所这样的事造就了一个美好的童年。每个人都认为在城市的废墟中长大是很可怕的经历，毫无疑问，对于丧失了一切的父母们来说事情的确如此，但对孩子们来说这却实在是最美妙的时光。城里的孩子们会接管整个被炸

毁的街区，宣称残留的建筑是他们玩耍的领地，并在其中实施伟大的冒险。你实在无须同情这些孩子，每一个我认识的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中度过童年的人都迷恋那段时光。这是一种最棒的无政府状态。没有管教人的父亲，也无规则可循，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创造一切(注释3)。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我有两段儿时的回忆至今历历在目，一次是罗森海姆被轰炸的一个晚上，妈妈把我和哥哥从床上拖起来，用毛毯包住后一手夹一个冲到了家后面的斜坡上。我们看到了远处一整片橙红色的天空，妈妈说道：“孩子们，我把你们从床上拉起来，因为你们必须看看，罗森海姆城在燃烧。”对我们来说罗森海姆是座位于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我们那儿有个山谷，山谷12公里开外的尽头是阿绍，那儿有所医院和一个火车站，再过去就是罗森海姆。不知怎么，对我来说那儿就是宇宙的尽头，当然孩提时我从没去过比罗森海姆更远的地方。事情显然是这样的，那一晚轰炸机飞到了意大利，却因为能见度太差而没有扔下炸弹，在往回飞过阿尔卑斯山后，他们为了不带着弹药回去，便在第一个能见度清晰的地方扔下了炸弹(注释4)。

第二段生动的回忆是我看到了上帝本人。那是在圣诞节，12月6日，也就是圣诞老人出现的日子，那天他会带着记录你一年坏表现的册子，身边还有个样子凶神恶煞的随从库兰普斯。这天我家的大门开着，突然间有个男人站在了那儿。我大约三岁，看到这情景逃到了沙发下面，还尿湿了裤子。男人一身褐色衣服，没穿袜子，双手还油油的。他看着我，神情温和而慈祥，我马上明白了这就是上帝本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电力公司的家伙，只是偶然路过而已。

母亲曾告诉我一件事，大约五六岁时，我得了一场重病。我们没法打电话叫救护车，而且因为雪积得太深了，即使真找到一辆，车子也开不进来。于是母亲把我用毯子裹住，系在雪橇上。她用了一整夜，才把我拖到阿绍，送进那儿的医院。8天后，她徒步穿越厚厚的积雪来看我。我对这

件事已经毫无印象了，可当时母亲却很惊讶，因为我一点儿委屈也没有，8天里就在独自玩一根细细的线，那线明显是从床上的毛毯上扯下来的。我丝毫没有厌烦：因为这根线对我来说充满了故事和幻想。

当时巴伐利亚是美国占领区，你还记得美国士兵吗？

当然记得。我记得看到吉普车开了进来，上面虽然只有65个美国人，却让我觉得这就是世上所有的美国人了。那些美国大兵们全都把一条腿悬在保险杠外晃荡，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口香糖。这也是我头一次看到一个黑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因为我只从童话故事里听说过黑人。这是个高大俊美的男人，嗓音迷人极了，我至今仍记得这声音。我大约和他交谈了几个小时，一次当母亲问我是怎么与他交流的时候，她说我这样回答道：“我们在说美国话。”他曾给我一些口香糖，我嚼了它们整整一年。毫无疑问，当时我们总是很饿，总在找吃的，这也正是多年后，我与迪特·丹格勒一见如故的原因之一。在《小迪特要飞行》中，他谈到曾经从被炸毁的房子里撕墙纸让他妈妈来烧，因为胶水里有营养成分。这种事儿我们从来不必做，对我们来说，情况还没糟糕到那种地步。一次我偶然看到几个工人打了一只乌鸦在路旁的锅里煮，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水面上漂浮着肥肉，之前我从没见过那样肥美的肉，这着实让我激动了一把。于是我便拿出一支在家附近的森林里找到的冲锋枪，也想射一只乌鸦下来，可我不但没成功，还被枪的反作用力弹到了地上。我母亲会使枪，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生气，更没有惩罚我。相反她拿着枪说：“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用它。”她开始教我怎么上保险，怎么退子弹，甚至把我带到森林里，向一棵粗壮的山毛榉的树干射了一发子弹。子弹直接穿了过去，我记得木头的碎片在另一面四处飞散。这时母亲对我说：“这就是枪会带来的后果，所以就算你手里拿着的是木头枪甚至塑料枪，也不要用它们瞄准任何人。”我当时完全被枪的暴力震慑住了，就此失去了对此类事物的好奇和关注，那以后，我甚至没用手指过别人。